

## 父亲的“坏”脾气

□ 淮南 武梅

父亲到了老年，脾气变坏了。

记得那几年，我非常害怕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。因为，那电话，不是告诉我父母生病的消息，就是说父亲又和母亲吵架了，母亲受了很大的委屈。每每此时，我都很无奈地叹息：这老头子怎么这样啊！

以前，父亲虽然严厉，但他极讲道理，从不和任何人争吵。特别对勤劳能干、温柔善良的母亲，他虽不会像别人那样娇宠疼爱，但也敬重有加，从不惹母亲生气。他和母亲携手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历尽艰辛，把儿女一个个培养成人，并各自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如今，他们虽然独自住在农村，那是他们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，也不适应城里相对封闭的生活，但儿女们都很孝顺，让他们的生活过得令乡邻羡慕。然而，父亲的脾气却没来由地变坏了。实在让我们费解。

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母亲打来电话说，父亲现在太难伺候，整天鸡蛋里挑骨头，无理取闹。今天说米饭硬了，吃了不好消化，明天又说米饭软了，吃

不出米香……

有一次，母亲流着泪给我打电话，说父亲因为一点小事，又和她大吵起来，甚至还动手打她。母亲说自己都七八十岁的人了，无缘无故地受父亲的气，实在冤屈。我自然很心疼母亲，也很生父亲的气，急忙请了假回家。本想好好地说说父亲，没想到，见我回去，父亲又是杀鸡又是煮咸蛋，还十分关切地问我工作忙不忙？孩子学习好不好？叮嘱我，在单位一定要和同事处好关系；对孩子不能要求太严；夫妻之间要互相谦让……中午，父亲还亲自下厨，做了我喜欢吃的菜，完全就是一个慈祥的父亲，与母亲叙说的父亲的样子，简直判若两人。父亲的表现，让我酝酿了一肚子的气，一句没法说出来。母亲更是一脸的诧异和气愤：当面充好人，背后是恶魔。

临走时，我说想接母亲去我家过几天，父亲说：“你们工作都很忙，她去了帮不了忙，还给你增加负担，就不让她去了。我和你娘在家过得很好”。虽然我看出母亲很想跟我走，但父亲这样说，我也不好强

带了母亲走。只能委婉地跟父亲说，希望他和母亲在家里好好的，让我能安心地工作，并带着父亲为我准备的各种土特产回城。

回来后，我照样时不时接到母亲告状诉苦的电话。可我们一回去，他就又表现得温和而慈祥。我们谁想接母亲出来，他都不让，就像离不开母亲似的。

今年五一节，我们兄妹几个相约一起回家，准备联合起来批评父亲，给母亲“申冤”。可我们一回去，他又故技重演。于是，我们轮番上阵，用各种方式，表达“希望他别再惹母亲生气，也让我们能安心地工作”的意思。没想到，他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带了几分诡秘地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我和你娘吵嘴了？你们不能只听你娘的一面之词，我不就是想让你们多回来几趟吗？”说完，竟然嘿嘿地憨笑，像个天真的孩子。

此时，我们才猛然醒悟：父亲这样做，原来是希望儿女常回家看看啊！

我的心里一阵愧疚。

##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其人其事

□ 合肥 施光华

几十年来，我听过和唱过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歌曲已经是无数遍了，脑海里常幻想着那草原、那美丽动人的姑娘画面。我有时在想，王洛宾创作的这首歌曲内容是真是假呢？如果是真的，它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姑娘又叫什么名字呢？今年初夏，我有幸去西宁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，带着这份好奇心，顺道来到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王洛宾音乐艺术馆，探一虚实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其歌曲的内容果然是真实的！

1939年春天，中国电影创始人郑君里去青海拍摄一部影片，经朋友介绍，邀请到了正在西宁任教的音乐老师王洛宾，一同前往青海湖畔水草丰美、牛羊肥壮的金银滩草原出演一个角色。当时他们一行人就住在当地一位千户长（相当于村长）家，千户长是藏族人，有三个女儿，都很漂亮，其中长得最美的是小女儿萨耶卓玛。此时萨耶卓玛17岁，正值情窦初开年龄，她的头发梳成10多条小辫子披在身后，两只大眼睛闪烁着大胆而热烈的光芒。那时金银滩有个说法：“草原上最美的花儿是格桑花，青海湖畔最美的姑娘是萨耶卓玛。”卓玛出演剧中“牧羊女”，安排王洛宾身着藏袍，扮演卓玛的“帮工”。拍摄计划安排三天时间，在拍摄过程中，剧中有一个情节，王洛宾和卓玛同骑一匹马，活泼大胆

的卓玛时而驱马狂奔，时而勒马立起，为了不使自己摔下来，王洛宾只好紧紧地抱住卓玛的腰……

这一天傍晚，当天拍摄任务完成了。黄昏时分，“牧羊女”卓玛和“帮工”王洛宾共同赶着羊群，回到了羊圈，仔细清点羊只的数目。夕阳下的卓玛亭亭玉立，晚霞的余辉映照出卓玛的倩影，她举起了手中的牧羊鞭，轻轻地打在了王洛宾身上，转身跑了。王洛宾呆立在原地，仔细地回味这一鞭的滋味……之后的几天里，他们在酒会上对歌，在草原上赛马，晚上同坐在一匹马上看电影。

三天的拍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第四天早上摄制组就要离开青海湖回到西宁去，卓玛前来送行，王洛宾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头张望，每次回头，卓玛仍站在那里向他挥手，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……在返程的骆驼背上，王洛宾望着这高耸的雪山、辽阔的草原、湛蓝的湖水、成群的牛羊，卓玛美丽的身影和含情脉脉的眼睛总是浮现在面前，他澎湃的思念激情和写曲热情喷涌而出，奋笔疾书，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这首歌曲就这样诞生了！

走出王洛宾音乐艺术馆，我在金银滩草原逗留了几天，发现今天的青海湖畔以卓玛为名的女孩特别多，或许都是那首歌曲的缘故。

## 知青朱老师

□ 大连 孙长乐

我的少年时光是在农村度过的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跟随父母下放到了农村。下放的第二年，我就到了入学年齡，按理说，适龄儿童应该到我们大队的那所学校上学，可由于那里缺少教室，一年级和二年级我都是在生产队念的书，教室就设在我们生产队徐队长家的西屋。当时的班主任是朱老师，她是个插队知青。

那时朱老师二十来岁，清秀文雅，每天穿的衣服都是干净整洁，一尘不染。我们上二年级时，极爱干净的朱老师，做了一件在当地家喻户晓的事儿。

有一天上午，徐队长跟他老婆在家中打了起来，徐队长把老婆打了一顿后就出门了，他老婆一气之下，在家里喝了一些农药，一个老太太去他们家串门发现后，在院子里大声喊人。徐队长两口子住在东屋，与我们教室仅隔一屋，那天朱老师到大队学校开会去了，我们在教室里听到喊声，全都涌出了教室，那老太太看到我们，就吩咐几个孩子快去找大人来救人。

不一会儿，就有几个人跑了过来，跟着徐队长也回来了，大伙儿就把徐队长老婆抬到院子里。我们看到，这时她的呼吸极其微弱，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农药味。我们那地方唯一的一所医院是公社医院，离我们生产队有十几里路，把她送到医院去抢救，恐怕是来不及了。那个老太太叫徐队长去茅房里舀一些粪水，她说：“现在得想法叫她把肚子里的农药吐出来，给她灌些粪汤，她就能把农药吐出来。”

徐队长连忙找了一个舀子，舀来一些粪水，扒开老婆的嘴巴，倒进她嘴里一些，可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正在大伙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朱老师回来了，看到这情景，询问过后她便在徐队长老婆身边俯下身，用双手挤压她的胸口，接着朱老师与徐队长老婆嘴对嘴，进行人工呼吸。徐队长老婆满嘴都是粪水，朱老师视而不见，毫不在乎。经过一阵人工呼吸，徐队长老婆的呼吸见强了，接着她大口喘息一会儿，便张开嘴巴呕吐起来，她吐完后，朱老师又让徐队长弄了一碗淡盐水给她喝下。见她脱离了危险，朱老师便叫徐队长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，让医生检查一下，做些治疗。徐队长就叫人把队里的马车赶来，用马车送老婆上医院。

徐队长和老婆坐马车离去后，大伙也散去了，我们也回到了教室里。朱老师洗了脸、刷了牙后便来到教室，她一进屋，我们全班人都不由地把目光投向她的嘴巴，朱老师望着我们笑笑，认真地说：“遇到人命关天的事，救人是最要紧的。”

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朱老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。听说，她毕业后留在北京，在一家出版社工作。

## 老家的土灶

□ 大连 张淑清

老家的土灶很简单，用土坯垒成的，上面抹一层水泥压实，大铁锅都是父亲徒步从七里外的乡供销社买来扣在头上，顶回来的。土灶左下方泊着风匣，旁边立着一口盛水的泥瓦缸，缸上趴着一只铁舀子。土灶右侧堆积着斧子剁好的苞米秸秆，细细的刺槐枝儿。

灶台是故乡的一种语言，每天第一个醒来，袅袅的炊烟点缀着村庄时，我们枕着小煎鱼和苞米粥的饭菜香不肯起床。炕的温度刚刚好，母亲自菜园子里摘几枚顶花黄瓜，插板子插好拌了大豆酱，那清醇的黄瓜味一波一波溜进房间。

必须起来上学了，在灶台对面钉着一枝三角架的木头，铜盆搁在上面，我们每天都在这里洗脸洗手。吃了早饭，隔三差五的，母亲在锅里取出两个红皮鸡蛋，让我们揣着课间休息时吃，灶台简易，日子也朴实如院里的向日葵。只是，母亲围着土灶忙忙碌碌的身影却是世间最暖色的风景。

土灶上的光阴细细碎碎，没有奢华。吃的粗包谷和青菜，均是自家土地的果实。记忆中，母亲腋窝夹着一绺墨绿晃进厨房的一幕，依旧映日桃花似的活在灵魂里。

灶膛的火苗哔哔啾啾，婴儿的小嘴样地舔着锅灶，铁锅里咕嘟咕嘟冒出喷喷香的饭菜味儿，母亲看我一眼，“洗洗手，马上开饭。”

家里来了客人，小孩子上不得台面，母亲就把我们安排在土灶前吃饭，平素吃不到的咸鸭蛋，腊肉丁，这会子站在土灶前，抡圆了胳膊可劲吃，连盘子里的汤汁也不剩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母亲和土灶是岁月里的一道景致，伴随着我们的成长。土灶端出来的粗茶淡饭喂养了一代代人，也喂养了乡村。

从呱呱坠地后土灶里盛出的第一碗红糖水，到蹒跚学步，读书考学成家，土灶与母亲陪着儿女山一程，水一程。住在宽敞舒适的楼房，没有了土灶相依相偎的日子，生命里仿佛少了什么？细细咂摸，才发现是少了盘根错节在心底的乡音乡情。

于是，很多个节假日，乘车返归老家，守着日渐老去的父母，亲自下厨，在土灶上，烹饪一桌田园饭菜，一家人围坐在大炕，一筷子一筷子地咀嚼旧时光。

老家的土灶，不仅仅是母亲的岁月，更是烙印在每个人胸膛上的文字，只要轻轻吟读，便泪流两行。